

2014年4月至 8月國史館邀請 海外學者專題 演講紀要： 沈志華、馮筱才 江勇振、王國斌 朱莉、林培瑞

李宗洋 國史館研究助理

沈志華：亞洲冷戰的起源—— 從中蘇結盟到朝鮮戰爭

一般認為亞洲冷戰先於美蘇冷戰，不過國共內戰是中國內部問題所引發的戰爭，與冷戰並無直接關係。因此，亞洲冷戰的起源，應視中共何時加入社會主義陣營，以及國民黨何時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而定。

1945-48年間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檔案，在每年700-900個討論和決議中，與中國有關的，每年至多7個，且多是涉及外蒙、新疆與東北，顯示蘇聯並不重視中國問題。史達林為維護蘇聯在遠東的利益，在雅爾達會議提出對滿、蒙等地的要求，藉由與國民政府的合作，取得在東北的利益。當國民政府無法給予蘇聯東北利益時，便將眼光放在中共身上。1949年中共與蘇聯為了渡江與否產生歧異，毛澤東首度掌握主動權，史達林開始疑慮毛澤東可能成為狄托第二。

中共新政權建立後亟需蘇聯的協助，毛澤東藉向史達林祝壽之機前往蘇聯。史達林堅持保留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」，毛澤東則設法迫使史達林同意商定新約。但蘇聯提出的新約內容卻與前約並無二致，中共於是緊急起草對案，蘇聯起初雖反對，但為避免中共倒向美國，最終還是同意了中共的對案。

戰後朝鮮半島由美、蘇託管，李承晚和金日成深知要統一朝鮮半島，勢必得依靠武力；但對美、蘇來說，雙方無意在此啟釁，



沈志華教授（攝影／陳世局）

也反對以武力解決朝鮮問題，因此自 1948 年底起蘇、美相繼撤軍。但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」簽訂後，史達林力謀補救損失，朝鮮問題便成了解決辦法。此時蘇聯截獲麥克阿瑟發出的電報，加上艾奇遜表示臺灣和朝鮮半島不在美國遠東防禦線之內，史達林因而研判美國不會為此干涉遠東事務，於是史達林便同意金日成的軍事提案。

金日成引發韓戰後，美國立即投入戰事，蘇聯於是希望中國作好援朝準備。美軍的參戰使北朝鮮軍隊幾乎全軍覆沒，金日成於是向中國求援。為此，中、蘇雙方為援朝問題幾經角力，最後才在毛澤東乾綱獨斷之下派兵援朝。長期以來，學界認為中國參戰是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。但沈教授認為中國參與韓戰若能保障自身安全，前提必須是中國軍隊能打退美軍，否則就是引火燒身，可見

毛澤東出兵的決定，並非出於國家安全，而是透過中國軍隊不計代價的犧牲，向史達林證明中國是聽從蘇聯指揮的。此舉純出於鞏固中共政權的需要。幸運的是，毛澤東贏得了史達林的信任，也使中蘇同盟得以鞏固。美國據此判斷中、蘇已經成為一個穩固的同盟，遂在亞洲建立防堵共產黨的軍事同盟體系，自此之後亞洲便進入了冷戰時期。

馮筱才：史料與方法——中國當代史研究之新動態

對中國大陸史學界而言，「中國當代史」是指 1949-1976 年間的中國史。中國當代史研究主要緣於中國至今尚處於黨國威權時代，毛時代所奠下的基礎至今仍無法擺脫其影響。因此，若要了解當下中國，勢必要對毛時代進行全面性的探討。其次，中國發展的過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不同，在高度經濟發展之下，伴隨著社會的高度緊張、對立，整個社會處於準戒嚴狀態，實無法援用西方的經驗來作詮釋。況且長期以來對於研究毛時代充滿禁忌，致使該時期成為中國歷史敘述的斷裂帶，使得學界與政界對毛時代的歷史定位產生了爭論。

中國的檔案經常是公私混合的，這是共產國家的特色，尤以個人檔案最為龐大。近年來隨著檔案資料相繼開放，使得新史料不斷出現。官方檔案的選擇性公布，使得研究者可以有限度地了解官方內部的文件。而民



馮筱才教授（攝影／林正慧）

間史料大量的湧現，例如日記、筆記、信札、個人卷案與各單位應銷毀而未銷毀，而外流的檔案。中國的官方檔案館有雙重功能：一是保存檔案；一是銷毀檔案。銷毀的檔案大多是針對過去的黑材料加以銷毀，銷毀的方式，由檔案單位自行銷毀，或是由檔案單位外包給造紙廠銷毀，在此過程中易使檔案外流，成為所謂的「民間檔案」。

出於黨史的需要，中共著手編纂國家領導人文集或年譜。徵引的史料都是經過篩選，但由於領導人的檔案不被允許查閱，因此這些出版品便成為了解中央檔案館典藏檔案的唯一窗口。其次，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強制性地修纂地方史，編纂整理許多檔案史料。復以民間史料的大量出版與中國官方推動了「中國記憶」文化工程，對老幹部進行廣泛的口述史，地方文史工作者與學術機構也積極地進行口述史。雖然這些口述史的

問題在於流品不一，欠缺學術性的規範，但仍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。以上種種都使得當代中國史研究成為可能。

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問題在於檔案數量龐大，同質性高，且建構性過強。檔案中的報告，表面上是反應人民的心聲，實際上是為了政策辯護而產生，是刻意製造出來的檔案。中共檔案中的語言和文本與現行使用者有落差，如果單從字面上的概念、詞語與句子來理解會產生誤解。例如「人民」不能解讀為 *people*，而應解讀為「不是敵人的的人」。此外，中國的歷史研究尚存有政治禁忌、安全顧慮與利益問題，都造成研究上的困難。

因此，中國學者偏向於宏觀性的通論、政策的描述或對單一資料的解讀，以及過於信賴官方史料的說法，造成歷史研究同質性高的困境。為了避開禁區，研究者往往選擇較安全的專史研究，造成缺乏問題取向或理論建構的歷史研究。近年來，中國學者開始跨過 1949 年的歷史，重視歷史的連續性，並深入了解中共早年及建國以後的歷史發展，試圖貫穿「前、後三十年」的歷史發展，以解釋當前中國的發展。學者已逐漸不滿足於文本的考察，開始重視文本底下的動態過程，並對於「標籤化」與「概念化」進行反省，對毛澤東時期的歷史考察也更加精細化、微觀化及內部化，同時對於「人」的因素有更加深入的關注。中國當代史研究也由零碎化的研究，轉向重視整合性的研

究，不再是單一的文化史或社會史研究。

江勇振：全球在地化下的族群意識

江勇振教授在進入主題之前，先舉了兩個例子作為演講的引子：第一個例子是 Peter Charanis，1908 年生於利姆諾斯島（Lemnos），當時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子民，4 歲時希臘占領了利姆諾斯島，Charanis 與一千小孩好奇地去看希臘駐軍。希臘士兵問他們：「你們在看什麼？」小孩們回說：「我們來看希臘人。」希臘士兵反問：「你們不也是希臘人？」小孩們回說：「不，我們是羅馬人。」長大後，他的族群認同已經轉變為希臘人。

第二個例子是 Nükhet Kardam。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代，「土耳其人」其實是一個貶詞，用來指農民，貴族們則自稱「奧斯曼人」，直到 1923 年凱末爾建立新土耳其後，才以政治力量改變民族認同，「土耳其人」成為正面名詞與國族認同。到美國後，Kardam 面對美國人對土耳其的陌生與不確定，開始反思「土耳其認同」，發現「土耳其人」本身就十分複雜，以他的家族為例，外曾祖父是羅馬人，外曾祖母是庫德人，一位嬸母是希臘人，家族中所收養女孩極可能是亞美尼亞人，這樣複雜的構成，卻都被統合到土耳其人的族群認同之下。

上述兩個例子說明：族群認同可能會與

現實脫節。例如 Peter Charanis 自認是羅馬人，但東羅馬帝國在 1453 年已經滅亡，這種羅馬人的認同，在帝國滅亡後仍持續了五百年之久。族群認同是透過篩選與遺忘形成的，族群概念雖然能用國家力量加以塑造，但族群概念也受到其他作用力的影響，比如全球化的挑戰。

全球在地化（Glocalization），是結合全球化（Globalization）與在地化（Localization）的複合字。最初由日本經濟學家於 1980 年代所創造出來的行銷策略，目的在使日本跨國企業更有效地打入市場，強調全球化必須與在地化結合。這樣的概念為各界學者所接受，被用來指稱全球化的在地化現象。亦即在全球化下，有著在地化對全球化的抵抗，因此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既是相輔相成，也存在緊張對立。

族群概念是一種變遷的概念，1980 年



江勇振教授（攝影／林正慧）

代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人是沒有種族主義，只有文化主義的觀念。20世紀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，由於受到西方民族主義的衝擊，應運而生反滿的、黃種至上的種族主義。但不論是對內或對外都具有差別性，乃因種族內部的性別、階級、省籍、族群之差異，產生了內在的分歧。中原沙文主義不一定是以中原地區的華人為主，反而以「邊緣」的華人作為中原沙文主義的支持者，侯德健所寫的「龍的傳人」便是一個例子。

1980年代，亞洲四小龍崛起後，余英時和杜維明便意圖從儒家傳統，回應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。在他們的論述中，中國都被排除在中國民族主義之外。這是因為此時中國並未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1988年中國的經濟表現比西非的12個國家還差。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，經濟大幅崛起，2010年以後，以購買力平價（PPP）計算，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，內在族群的矛盾也更加嚴重，特別是西藏和維吾爾問題，因此中國政府一再強調「和諧」，但卻被以諧音譏之為「河蟹」。

全球化並不等於地球村，不是單一地將全球化複製到受影響的各個角落，而是透過在地化的方式，達成了全球化。同時，全球化也刺激了在地化的發展，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提升，近年臺灣的公民運動即是。今日研究族群主義，還是不能無視本質主義者的論調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白狼在太陽花學運

期間的言論。全球在地化本來就不是一種均衡的發展，其本身包括兩個不對等的權力，一是全球化下的跨國企業所掌有的權力；一是一般民眾的在地化運動。

王國斌：清末民初中國的產業與鴉片——近代歷史變遷的兩個視角

宋代以來，中國市場經濟即很發達，許多鄉村家庭都參與了商品經濟。一般農家不僅從事農作，農餘時也從事手工業，同時期歐洲手工業則集中於都市。此外，中國的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有著密切關係，絲織品、茶葉及陶瓷等皆來自於農村，有著綿密的產品經濟網絡，其後鴉片便透過這個網絡，迅速擴及中國各處。另一方面，英國將鴉片輸往中國，除為了緩解白銀的流失，也為了控



王國斌教授（攝影／陳世局）

制與發展印度。但到了 19 世紀後半，中國也廣種鴉片，取代從印度進口鴉片。

鴉片向被視為有害，但從經濟角度來看，鴉片是高利潤的經濟作物。18 世紀時，鴉片是菁英分子的休閒娛樂，19 世紀普及到社會各階層。鴉片具有複雜的文化意象，它是消費文化的代表，其吸食工具是近代中國手工藝高超技術的展現。另一方面，鴉片造成的社會問題，迫使政府必須加以限制。

中國政府的鴉片政策是矛盾的。一方面出於道德性與社會性的考慮，將鴉片視為非法，致力於撲滅鴉片；另一方面，鴉片是稅收的重要來源，加上政府力量有限，縱然有心打擊鴉片貿易，卻往往無法持續性地落實。

中國的工業化發端於 1870 年代，但至 20 世紀初才在都市發展起來。至 1920 年代，上海、東北、天津、武漢已成為工業發達之處。相較於英國、日本，中國的工業化似乎較為緩慢，這是因為忽視了中國與英國、日本的地理差異，後者並不像中國的廣土眾民。同時，中國的工業化不僅發生在都市。歐洲在發展工業化的過程中，鄉村手工業幾乎被都市工廠取代；但在中國，都市化並不必然摧毀鄉村的手工業。中國的工業化是城鄉並舉的，究竟是好是壞？學界仍無定論。主張鄉村工業化是工業化的迂路者認為鄉村工業化欠缺規模、技術，生產力無法提高，因此無益於中國的工業化。但主張鄉村

工業化是中國工業化發展一部分的學者則認為，這是在有限資本、技術下有效發展工業化的手段。

自強運動所關注的是增強國力的重工業，而非民生工業。民國以後，中央與地方政府均有工業化計畫。至 30 年代起，將工業化與鄉村建設做出區隔。1933 年國民政府推動統制經濟政策，這是抗戰前即已推動的經濟政策。50 年代中共全面推動統制經濟，不再支持鄉村的商品經濟，並透過戶口制度與工業政策，將城市、鄉村分開。80 年代中共改革開放後，鄉鎮企業再度出現。至 90 年代城市工業壯大後，鄉鎮企業便趨於衰弱。

中共並非首次嘗試統制經濟的政權，早在 30 年代國民黨便已為之。中共的統制經濟，徹底打破了市場經濟，並將城市、鄉村切隔開來。中國一直存在著統制經濟的政治思維，沒有真正經歷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，因此中國近代轉變的正面與負面影響，都具有共同因素。

朱莉：從養軍到養民——戰後蘇南與臺灣的糧食供應

朱莉教授從 1949-53 年間臺海兩岸政府的糧食政策，說明其鞏固政權手段的異同。首先關注三個重點，分別是恐怖手段（鎮壓反革命與白色恐怖）、土地改革，以及糧食供應與糧政。三者都是鞏固政權的重要方

式，不過由於主觀上受到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，與客觀上兩岸的經濟規模、歷史發展都不同，因此學者總是選擇迴避這個問題。

朱教授選定蘇南地區作為與臺灣對比。由於蘇南的經濟規模及發展歷程與臺灣相似，兩者都是由外來政權所統治，加上蘇南地區的資料相對於中國其他地區來得開放，有助於研究的進行，特別是 50 年代初期，兩個政治立場相異的政權，為何採取了相同的政策？又為何到了 50 年代中期，兩者的政策又走向分歧？

由於戰爭的影響，中國社會自 1937 年起更加走向軍事化。長期的戰亂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。國民政府為了確保軍糧，以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機關控制米價，顛覆了自明代以來的貨幣經濟，使米糧產生貨幣化的趨向。在具體措施上，國民政府採取了直接徵糧以供軍用；其次，以統購統銷的方式，透過糧票與特別商店，配給公教人員；一般民糧則是透過組織米糧業同業公會，管理米商，使政府得以直接控制市場與糧價。

1949 年以後，海峽兩岸受到上述經驗的影響，在糧食供應上採取相同的作為，國、共兩黨都恐怕物價飛漲，而影響政權穩固，因而提出相似的口號。且兩個政權都不信任自由市場，而採取了嚴控手段，使米糧「從苗到飯」都受到政府的監督。諷刺的是，向來反對國民黨政策的共產黨，在 50 年代也採取了相同的政策，成立米商同業公會，以監督糧價。1949 年下半年，中共為



朱莉（Julia Strauss）教授（攝影／林正慧）

了恢復生產，鼓勵上海的米行開市營業；而上海糧食局為保障糧價、維持糧食供應穩定，乃成立上海糧食公司，直接控制米糧的運輸、倉儲及銷售。1950 年代初期，私營米商與官營糧食公司並存，但 1952 年之後，由於「五反運動」與統購統銷制度的確立，徹底消滅了市場經濟。

國民黨政府在臺執政初期，糧食政策仍保持軍公教制度，對糧食市場進行管理。與中共相反，國民黨政府偏好間接徵糧，委由農會徵糧，並恢復日治以來便已存在的農會，將臺灣省糧食局所有之倉庫和碾米廠廉讓給農會。透過農復會執行專案，由非官方、在地人掌握，但置於政府嚴格監控下的農會執行「肥料換穀」政策，既使農民取得肥料，以提高產量，也使政府可避免直接徵糧，與地方產生摩擦。

因此，50 年代兩岸政府推動糧食政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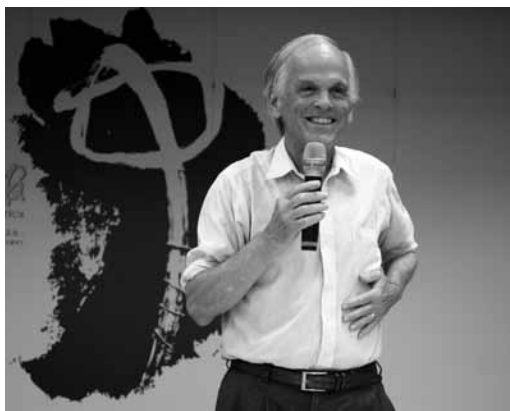
的具體方法並不一樣，但兩岸也有不少共同點。就目標上來看，雙方都透過保障價格與供應的穩定，使政權鞏固。但共產黨政府相對於國民黨政府，傾向摧毀自由市場，而由政府進行直接的控制；國民黨政府則偏好透過委託可信任的地方組織進行間接的控制。

林培瑞：鱷魚鳥——五十年代中共的相聲改革

提起相聲的起源，有人認為源自《史記》中提及的俳優，或是唐代的參軍戲，但這樣的說法十分牽強。真正與相聲有關的，應該是宋代的口技、清代的隔壁戲之類的口技。不過，成熟的相聲應該是到晚清才出現。

晚清以來，有兩項因素改變了相聲的表演藝術，一是政治；一是科技。科技增進了相聲的傳播能力，同時改變了相聲的表演方式。30年代的相聲是在戶外表演，灑上白沙，定出表演的場地，捧哏和逗哏分立兩側，兩人相對表演。表演之前，逗哏先唱太平歌詞並講一段墊話，講述接下來表演的內容；捧哏則拿出小碗，收取費用。50年代相聲改在劇場內表演，聽眾都是買票進場的，表演者並肩站在臺上。相聲演員和觀眾的互動也改變了，特別是當相聲表演上了廣播、電視和網路之後，這樣的互動更少。

政治方面包括了兩個面向，一是共產黨透過相聲推動政治宣傳，並作為教育民眾使



林培瑞（Perry Link）教授（攝影／林正慧）

用普通話的工具；二是民眾運用相聲來諷刺時政。1950年中共文化部在保持相聲的形式，並灌輸「健康」的內容下，宣示要「相聲消除野蠻、恐怖、淫穢、奴化、庸俗，以及不愛國的東西，而代之以健康、進步而優美的元素」，此一宣示受到相聲演員的歡迎，侯寶林等人邀請老舍參與相聲改進小組，重新審編舊段子，並編訂新段子。

對相聲演員而言，困難之處在於如何將諷刺時政的藝術，改用為吹捧新社會。首先，他們運用「貫口」來歌頌新社會，然而「貫口」只是一連串地講出一堆話，但不能點出問題，也不夠有趣，因此效果不好。其次，他們運用相聲來諷刺新社會的敵人，但這也不能點出社會的問題。因此相聲演員找到了一個新的方式，他們運用諷刺的手法嘲諷「人民內部的矛盾」，只是這類段子也不算成功，像「西行漫記」就過於教條性而不

具趣味性。最為成功者，當數「買猴兒」，這個段子點出了公務員的懶散和盲從、官方語言的膨脹和空虛，但並沒有真正的壞人，只是「人民內部的矛盾」。

上述相聲的改革，可說已經達成了預設目標，但相聲的笑與應笑之間卻存有一些「問題」。中共文化部門的官員曾提到「相聲主要給廣大群眾聽，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能了解美帝的本質和內部矛盾，光用諷刺語氣提到民主、言論自由、合法程序、科學文明，這一連串的反話，在思想上會引起一定

程度的混亂」。例如在「如此美國」中有一段提到「美國的摩天大樓有多高，我們搭了三個小時還沒能到頂樓，後來才發現原來是電梯工人罷工」，雖然這引人發笑，但也給人摩天樓很高的印象。因此在反右運動時，這些相聲演員和相聲段子都被打成右派並予以鎮壓，致使相聲演員不敢再放膽高言。

相聲演員和中共的關係，就如同鱷魚與鱷魚鳥一樣，在鱷魚巨顎闖上之前，兩者的關係是十分友善的。然而一旦巨顎闖上，鱷魚鳥和相聲演員都會遭到不幸。

新書 預告

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：中國遠征軍

國軍戰史中最光輝的一頁
中美英盟軍並肩作戰

仁安羌解救英軍七千人
緬甸戰場揚威異域

收錄中國遠征軍的第一手珍貴史料
(預定 104 年 7 月出版)